

日本馆藏抗战资料与国内史料的互证与重构

龙潇

湖南科技大学, 中国·湖南 湘潭 411100

摘要: 湖南作为中国抗战时期的重要战略区域, 经历了大规模战役、城市沦陷与民众动员等多重历史事件。长期以来, 对湖南抗战史的研究多依赖国内档案、回忆录与地方志资料, 然而日本方面的战争记录、军报、情报文件等尚未充分纳入系统研究视野。本文立足于日本馆藏相关湖南战事档案, 以东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国立公文书馆、靖国神社资料馆等馆藏资料为基础, 结合中国国内保存的文献进行比对互证, 旨在从对比文本中厘清战役过程、还原历史现场、识别史料偏误, 并据此对抗战史的叙事结构进行反思与重构。通过中日资料的互证分析, 不仅可以丰富抗战史的资料体系, 还可提升史学研究的精度和可靠性, 对构建去中心化的中国抗战叙事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关键词: 抗日战争; 湖南战区; 日本馆藏; 史料互证; 历史叙事重构

Mutual Verific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Anti-Japanese War Materials in Japanese Collections and Domestic Historical Records

Long Xiao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Hunan Xiangtan 411100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reg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China, Hunan witnessed large-scale battles, the fall of cities,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the people. For a long time, research on the Anti-Japanese War history in Hunan has mainly relied on domestic archives, memoirs, and local chronicles. However, Japanese war records, military newspapers, and intelligence documents have not been fully incorporated into systematic research.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relevant Hunan war archives in Japanese collections, using materials from the Institute of Defense Studies of the Ministry of Defense in Tokyo,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and the Yasukuni Shrine Archives, and combining them with domestic Chinese documents for cross-verification. The aim is to clarify the battle process, restore the historical scene, identify historical material biases, and thereby reflect on and reconstruct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history. Through the cross-ver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materials, it can not only enrich the data system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history but also enhance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historical research, which is of significant academic importance for constructing a decentralized narrative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China.

Keywords: Anti-Japanese War; Hunan Theater; Japanese Collections; Cross-Verif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

0 引言

湖南地处中国腹地, 自 1938 年武汉会战后成为日军深入中国内地的战略要道。长沙、衡阳等地反复成为中日交战的焦点, 尤其长沙三次会战、衡阳保卫战等, 在中国抗战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国内关于湖南抗战的研究成果丰硕, 然而仍存在若干显著问题: 其一, 史料来源多集中于中共党史资料、国民政府档案、地方县志与当事人回忆录, 虽然丰富却存在主观性强、重复度高的问题; 其二, 对日方战争资料缺乏系统整理和深入利用, 导致抗战过程中的敌军视角及战略考量被严重忽视。随着日本方面战时档案不断解密, 大量关于湖南战区的军事部署、作战细节、占领治理、战后评估等资料逐渐进入研究视野, 亟待学界

从互证角度对中日史料进行交叉比对与深度解读。本文聚焦日本馆藏中有关湖南抗战的原始资料, 与国内已有史料进行互证, 通过文本解构、语义分析与叙事考察三种路径, 探讨历史叙述中的缺环与误读, 重建更加多维、立体与精准的抗战史图景。

1 日本馆藏湖南抗战资料的类型、来源与使用价值

1.1 日本军事档案的馆藏结构与湖南战区资料分布状况

目前日本保存较为系统的战时军事资料主要集中于东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国立公文书馆与靖国神社附属游就馆。其中, 防卫研究所所藏陆军档案卷宗较为完整, 涵盖

战区战斗详报、部队日记、战略指令、情报回报等，尤以“支那派遣军作战记录”“第十一军行动详报”等系列文献中，湖南相关战事记录较多。此外，日本陆军的师团战史、军官战后回忆稿也提供了对中方战略行动的对照记述。靖国神社馆藏虽以展示为主，但其影像资料与私人捐赠手稿亦有助于理解战事背景与基层士兵的心理状态。

1.2 湖南相关战役日军档案的核心内容与记述特征

从湖南地区的主要战役来看，长沙会战（1939—1942）、衡阳保卫战（1944）是日军档案记录的重点。日方在长沙战役中留下的大量战斗日记与地图反映出其作战部署之精密，同时也反映了对中国守军火力分布和地形利用的高度重视。衡阳保卫战中，日军第十一军记录了对中国守城军民坚韧抵抗的惊异与战略上的无奈，从而提供了对国内“英雄叙事”的有效佐证。档案中日军对湖南地方治理的记载，如战区政情报告、物资调配、治安记录等，也为研究日军在占领区的政策与影响提供一手材料。

1.3 日方资料的可信度辨析与价值重估

尽管日本馆藏资料提供了宝贵的信息资源，但其中亦不乏政治修饰与认知偏差。例如战斗结果往往有夸大战果、压缩损失的倾向；对中国军队描述常带有贬低色彩；对日军暴行多选择性失忆。因此，使用时需结合中方资料进行反向验证，同时也应关注其中未被刻意淡化的细节信息，如基层士兵的困惑、后勤困境、战斗中士气波动等，这些片段往往更具史料价值。通过建立“中日镜像式”的文本分析框架，有望在对比中析出事实、揭示机制、识别叙事结构的主客观交织关系。

2 国内湖南抗战史料的结构体系与叙事框架

2.1 传统地方文献与英烈记述的局限性与价值

地方志、县志与村志作为基层资料的重要来源，收录了大量抗战时期的事件记载与人物传记，尤其在描述保卫战、地方游击队行动、民众支援抗战等方面资料详尽。然而由于成书时间多在1980年代以后，政治导向与意识形态影响较为突出，纪实性、可核实性受到一定影响。英烈录、烈士传记等史料虽有情感张力，但在叙述结构上趋于模式化、脸谱化，导致信息层次单一，无法还原复杂的历史场域。

2.2 党政档案与新闻文献的叙述倾向

国民政府时期湖南省政府公文、军事委员会令文、中共地方党史资料是重要的原始文献资源，包含大量关于兵员调动、资源分配、民众动员等数据。然而，抗战时期政治多元性强，不同系统的文献记载存在视角割裂。中央与

地方的信息传递亦不顺畅，导致数据层次混杂、事件时间错位。此外，抗战时期的新闻文献、广播记录虽具时效性，但多为政治宣传之工具，内容真实性需结合其他类型文献加以验证。

3 中日史料的互证路径与文本解构方法

3.1 战斗过程的交叉验证与细节还原

通过对日军战斗详报与中方部队报告的比对，可以辨识出战役中双方记载的异同与矛盾之处。例如长沙会战，中方史料强调成功阻击了日军的三次大规模进攻，并以兵力薄弱但士气高昂为叙事核心；而日方详报则详细记录其作战推进中所遭遇的困难，包括部队行军速度受限、后勤补给严重不足、因天气湿滑而影响装甲部队机动能力等。双方在记述胜负时虽有各自立场，但在时间节点、地理区域与战斗序列方面存在大量可对比信息。通过将双方关于部队调动与战斗过程的地图资料进行叠合，研究者可以更清晰地还原战役展开路径，识别实际战场推进的节奏变化与关键节点。

3.2 士兵视角的互证与战争体验的复原

士兵作为战争的直接承受者，其所留下的文字、口述与回忆往往携带大量关于战场真实状态与心理反应的一手信息。日本士兵手记中多可见其对湖南山区地形的抱怨，对粮食供应匮乏的不满，以及对战斗死亡率升高的恐惧，这些内容与中国民兵或地方自卫队队员的记忆记录存在惊人的情感共鸣。中国一线士兵在回忆录中提到的弹药紧张、伤病救治困难、战友牺牲频繁等细节，也在日军记录中有所呼应，形成跨敌对阵营的“情感互证”。此外，中国资料中对群众动员、妇女缝制军衣、儿童担任通讯员等片段，与日军士兵笔记中记录的“地方支援顽强、民兵伏击频繁”之间构成互为镜像的证据链。战争虽为国家行为，但其触达个体时表现出的情感维度却具有普世性，这一点在中日士兵资料对照中尤为突出。通过深入挖掘士兵视角，不仅能还原战争的微观经验，还能在国家叙事之外建立一种跨文化的共感逻辑，为战争史研究注入更多社会史与心理史的元素。

3.3 对暴行记忆的差异叙述与伦理评判

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暴行一直是中日历史记忆中最尖锐的部分。中方档案中关于日军在湖南地区的暴行有大量记载，尤其在衡阳、常德等地，关于屠村、强奸、焚毁、活埋等事件的民间口述史与地方志记载构成了系统性的证据链。而日方公开史料对此多选择性回避或予以模糊处理，往往以“战区肃清”“治安战术”等表述代替暴力细节。但

部分基层军官的日记、作战日志以及战后悔过文书中,仍可见有关“烧杀任务”“威慑式屠村”以及“对抗游击区进行清剿”等较为明确的描述。衡阳保卫战后,日军内部记录称“以军事惩戒处理该区”,在靖国神社相关资料中更试图将其正当化为“协助安抚地方”,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中国民间幸存者的口述中,对具体屠杀时间、实施部队、手段与受害者身份的细节描述极为清晰。

4 历史叙事的重构逻辑与文本再建路径

4.1 打破“胜败”中心的单一评价体系

传统抗战叙事往往因政治需要或意识形态塑造的原因,将“胜败”作为历史判断的核心坐标,将战争中的各种复杂因素简化为是否“打赢”“保住”某地、是否“歼敌”等表面性结果。这种以“结果导向”为中心的历史解释模式,不仅削弱了对战争全过程的理解,还容易将历史事件切割为离散的节点,忽视战争中的连续性与结构性动力。通过日本馆藏资料与中国地方史料的互证,抗战过程逐渐显现为一个包含战略选择、资源调配、兵员流动、情报误差以及心理战术在内的多因复合系统。例如,在衡阳保卫战中,中国守军虽在物资短缺、外援断绝、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失守,但其采取的“以小搏大”“节节固守”战术有效延缓了日军战略推进节奏,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军对华战局的判断。日军虽然在衡阳短暂占领了城市,却在战后留下大量关于士兵伤亡、战术僵局、后勤崩溃的内部批评文件,这些记录清晰地呈现出所谓“胜利”的惨重代价。因此,战役结果的“胜败”不能作为历史判断的唯一维度,唯有纳入全过程的交错信息,才能让历史叙述从单向线性走向多维立体。重构以过程为中心、以机制为支撑的叙事框架,是对抗战历史复杂性与真实性的基本尊重,也是对后人更具启示性的知识建构路径。

4.2 多维度叙事下的主体多样性复现

在过往的抗战史叙述中,主体形象往往高度集中,表现为英雄人物、指挥官与政治领袖的突出呈现,这种高度凝练化的主线固然有其鼓舞作用,但却忽略了更多普通个体在战争中的实际经验。尤其是在战争史向社会史、文化史转向的背景下,抗战中各阶层、各群体的生活与心理状态理应得到应有的学术关照。借助日本士兵的日记与战后回忆录,能够看到他们对湖南山区地形的畏惧、对激烈反抗的中国守军的敬畏,以及对国内战线漫长的质疑情绪;而中国方面的妇女组织档案、学生抗战宣传册、儿童回忆录等则提供了对战时社会生活的立体描绘,如妇女如何组织粮食转运、儿童如何在战火中避难求学、商人如何维系

供应链条,这些叙事丰富了战争图景的社会肌理。此外,一些地方史料中记载的土著民族、宗教团体、文人志士参与抗战的记录,也打破了“国共两极”构成的单一政治话语。日本资料中甚至可见战俘日记、士兵与湖南平民的交流记录,这种从对方视角中呈现的“他者印象”亦可作为对我方社会形象与战时状态的一种反向描写。因此,借由多元资料重建一个多元化的叙事空间,既是对抗战真实面貌的还原,也是对个体历史记忆的救赎,为未来抗战史研究引入更多跨学科、跨阶层、跨文化的研究范式。

5 结语

对湖南抗战历史的研究,既是对中国抗日战争地域性研究的深化,也是对构建宏观抗战记忆结构的重要支点。长期以来,抗战研究在史料使用上存在明显的内向型倾向,即以本国记忆、本土叙述为主体,不自觉形成一种封闭的解释系统。本文尝试跳出单一记忆轨道,通过系统整理和对比日本馆藏与国内相关史料,建构一种“互证式”的史料解读框架,力求在文本、语义与叙事层面实现对抗战历史的再审视与再构建。史料的异质性与多样性本身是一种学术资源,它不仅要求研究者具备解构文本的能力,更要求以跨文化、跨政治意识形态的冷静目光去理解战争背后的真实。中日史料的对读,不仅可以还原被掩盖的细节,更能够识别那些在宏大叙述中被遗漏的个体经验。透过日方资料所揭示的“敌视”与“困顿”视角,我们得以重新理解抗战胜利的代价和意义,突破对“胜败”的机械认知。

在叙事结构方面,本文强调以过程性、结构性与个体性为核心要素,倡导将抗战史从单调的政治线性叙述中解放出来,转向融合社会、文化、情感与伦理维度的多维历史编织模式。这种模式更符合新时代公共历史传播的需求,也更容易在青年群体中引发认同与共鸣。未来的抗战史研究不应局限于战役本身,而应将之置于更广阔的国际政治、社会结构与跨文化互动中进行解读。抗战不只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也是人类共同面对极端情境时的精神史、伦理史与生存史。尤其在当前国际关系复杂多变、历史问题成为外交争议焦点的背景下,更应以审慎与理性的学术态度推动中日之间关于战争历史的深度对话。

综上所述,以日本馆藏为补充资源,结合国内多类型史料进行互证研究,构建兼具纵向深度与横向广度的历史叙事结构,是提升中国抗战史研究学术品质与国际传播力的有效途径。这种研究方式不仅提升了史料的解释力,也为历史学科提供了跨文化比较与文本批判的新实践场域,有助于推动我国历史研究从“国家记忆”向“全球叙事”

转型，实现学术与现实的双重回应。

参考文献：

[1] 郭辉. 湖南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J]. 兰州学刊,2023,(06):5-29.

[2] 金安平, 李硕. 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07.364.

[3] 刘岳兵. 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涉史研究[M].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07.323.

[4] 刘志鹏. 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研究[D]. 山东大

学,2014.

[5] 张秀明. 海外华侨与抗日战争研究述评[J]. 抗日战争研究,2024,(02):124-143.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青年项目《日本馆藏湖南省抗战史料整理与研究》（22B0508）。

作者简介：龙潇（1983.12-），男，汉族，湖南省长沙市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从事世界近代史的研究工作。